

# 立人集团借贷危机发酵

■ 本报记者 刘凌林

在温州市泰顺县,一起由当地明星企业——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人集团)民间借贷纠纷引发的借贷危机正在发酵。

这起借贷危机也让地处浙江偏远山区,属于温州欠发达地区的泰顺县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2012年春节前夕,文成县人老刘,不得不把自己在泰顺县城经营了近20年的五金店卖掉,所得的25万元用来打发来他家要债的亲戚朋友,而这些钱也只够支付他们的部分利息。

“亲戚朋友天天找自己要钱,没办法。”老刘告诉记者,2010年,自己拿出40万元多年积蓄,投入到立人集团。去年,在立人集团一名夏姓财务人员的鼓动下,自己又以一分五厘的利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贷180多万元,包括之前投入的40多万元的本息共计265万元投在立人集团。

而随着立人集团借贷危机的崩盘,老刘一家立即陷入恐慌之中。“如果投入到立人集团的钱要不回来,就是卖掉现在居住的房子,也远远不够偿还借贷的钱。”老刘无奈地说。

实际上,类似老刘这样遭遇的在泰顺县可谓“普遍现象”。

立人集团部分债权人委托代理林才红告诉记者,涉及立人集团的债权人至少有5000人,涉案金额可能高达70到80亿元,是近年来类似案件中我国最大案件。

其中委托他代理的债权人有一百多人,债务金额在1亿元以上。“这个数字在变化中,还不断有债权人找来,要求代理其债权。”

自去年温州爆发民间借贷危机以来,一个个明星企业倒下了,立人集团没有幸免,资金链出现断裂,难逃一劫。

## 董事局6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12年2月3日,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被刑拘,同时该集团另外5名董事也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部分债权人从泰顺县相关部门得到的信息是,警方对董顺生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是监视居住,涉嫌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林才红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罪中量刑最轻的一种。”

从立人集团向社会公告无力偿还债务宣告崩盘到董事长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正演变为一起刑事诉讼案件。

2011年10月23日,立人集团宣布无力向社会偿付本息,不再承兑之前所借民间借贷,并进行资产重组,这一消息立即在当地炸开了锅。

2011年11月5日,立人集团召开“债权人代表大会”,提出三种资产重组方案:一是债转股,债权人债务转成旗下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内

2011年10月  
温州立人教育集团对外宣布不再承兑之前所借民间借贷

2011年11月5日  
立人集团召开“债权人代表大会”,提出三种资产重组方案:一是债转股,二是5年分期偿还,三是认购旗下的待建房产

2012年2月  
泰顺县政府成立立人集团债权处置办公室

2012年2月3日  
温州立人教育集团董事长董顺生被泰顺警方刑事拘留

2012年2月4日  
泰顺县官方表示,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尚在统计,涉及人数也尚未明确

蒙古鄂尔多斯煤矿股权;二是分期偿还,债务分5年偿还,每年偿还本金的20%,最后一年偿还本金、利息,利率以银行贷款同期基准利率计;若到期后仍不能按时还款,将拍卖资产偿还;三是认购旗下子公司江苏盱眙佰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待建房产。

据泰顺县官方消息,当时有代表18.4亿元债权的债权人接受这一债务重组方案。

但林才红代理的债权人没有接受这三种重组方案,这些人的涉及债权金额为1亿—2亿元。

在林才红看来,这三项方案可控性和操作性不强。因为,这部分债权人多为收入较低的普通民众,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借给立人集团的钱是通过亲友拆借,这部分债权人更倾向于债务折让,尽快获得现金偿还。

“这三种方案都无法接受,现在最急需的现金,可以支付亲戚朋友的借款利息。”老刘告诉记者,那些同意重组方案的人一部分是借贷时间长,借款本金已经收回,另一部分则为政府工作人员,因故不敢反对。

2012年春节前,一部分债权人曾多次同立人集团谈判,要求其先偿还10%,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一部分债权人遂选择上访。

之前,债权人希望通过起诉到法院,按民事纠纷解决债务问题,但温州两级法院不予受理,致使事件越演越烈,以致出现千人联名举报。

政府方面一直试图化解危机。据当地人反映,立人集团董事长被拘,是部分债权人上访压力所致。此番警方对董顺生等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王利博制图

被视作安抚部分债权人的情绪。

实际上,在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前,立人集团与债权人的纠纷正处于谈判和调解的过程中,事态正向各方有利的方向发展。

林才红告诉记者,就在董顺生被抓当天,部分债权人已经与立人集团达成先偿还10%借款的协议。“书面协议都准备好了,就等双方签字了”。

林才红称,当时,立人集团已卖掉一个煤矿收获1.7亿元,加上其他收益共有近2亿元资金,这对支付部分债务绰绰有余。

随着董顺生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事件已经进入“司法处置”阶段。政府全面“接管”了企业,债权人谈判的对象由企业转为县政府。

上述债权人老刘则担心,“虽然政府在管,但钱还是要不回来。”

## 涉案金额或高达80亿

泰顺县宣传部副部长洪周荣表示,对立人集团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企业自救”、“政府帮扶”、“司法介入”,现在已进入司法介入阶段,立人的资产由政府全面掌控。

2012年2月7日,泰顺县政府称,泰顺县已经成立了从十几个县级职能部门抽调的副职人员组成的立人集团债权处置办公室,专门负责事件总体处置工作。

2月8日,泰顺县政府公布了所掌握的立人集团资产简单说明情况,称迄今已经查明的立人集团的资产有22项,并宣布2月15日启动债权人登记工作。

泰顺县政府发出公告称,立人集团资产由政府依法全面掌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移、隐匿、处置资产,对所有债权人的债权依法进行登记、核查、确认、处置。

立人集团董事长董事雷小草曾向媒体表示,集团共负债22亿元左右,这其中大部分为民间借贷,只有极少部分的银行贷款。

林才红称,如果考虑到10年来立人集团向民间滚动融资及已经兑付出去的数十亿本金和利息,立人集团所涉及的民间融资累计金额可能高达70亿至80亿元。“这应该是我国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不过,泰顺县相关政府部门表示,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正在详细统计之中,涉及人数也尚未明确。而该县有关领导称,“债务涉及人员至少五六千人。”

实际上,去年政府就委托一家专门机构对立人集团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也出来了,但却迟迟不公布。“债权人要求公布审计结果,就是希望在资产处置过程中能在阳光下接受监督,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权益。”林才红说。

对于政府登记债权人的做法部分债权人并不认可。另一位债权委托代理人北京京哲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仁表示:“债权登记,既是民事诉讼的证据,也是刑事诉讼的证据,是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处置办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公告中)到处指定公安机关或法院接受债权登记。”

(下转第二十三版)

热点



## “短工化”就业 考验企业用工管理

■ 本报记者 刘凌林

元宵节后,本是企业招工的最好时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些企业主感叹:“现在招工越来越难了。”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而且“用工荒”无论从程度、范围,还是结构都趋于常态化。

然而“用工荒”的背后却是: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愈演愈烈。

2012年2月8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布的《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短工化”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就业一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主要体现在“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特征。

专家指出,在当前招工难、寻工难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问题突破口在于搭建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接平台。

### 农民工打“短工”趋势明显

“干不长、频跳槽,发展空间小、努力成效低”,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工众网联合研究中心联合组成的“农民工就业趋势”课题组概括的当下中国农民工就业趋势:农民工大多在打“短工”。

自2011年10月,“农民工就业趋势”课题组采取科学的调研方法,从工众网注册的近360万全国各地农民工中随机抽取2043位农民工进行了电话访问,首次基于规范的大样本调查描述了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而“短工化”趋势主要表现在“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

“短工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有相当大比例农民工是换过工作的,每份工作持续时间非常短,平均一份工作持续时间只有两年。”课题组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何江穗说。

调查表明,66%的农民工更更换过工作,25%的人在近7个月内更换了工作,50%的人在近1.8年内更换了工作;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两份工作的时间间隔约为半年多。

调查还发现,“短工化”趋势逐年递增。报告显示,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只持续了2.2年,缩短了近一半。

《报告》显示,工作“高流动”虽然给农民工带来薪酬待遇方面的一定提高,但在管理层级和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改善则相当有限,表现出“水平化”发展的格局。而且分析认为,这种趋势在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等因素上无显著差异。

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民工在用人单位中获得内部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超过1/3的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薪酬、技能和管理层级均未提升。这种格局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工工作的高流动有关。

从调查结果来看,超过60%的农民工因为对用人单位条件不满意而选择主动辞职,尤其在新世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更高。然而,农民工在用人单位间的流动也是“水平化”的,多数农民工换工作后并未获得职业地位的提升。调查显示,更换工作后,虽然有42%的农民工薪酬有所提高,但仅有11%的人在技术等级方面得到提高,还有15%的人在薪酬、技能和发展前景方面均未提高。

更引人注意的是,拥有中专、大专等较高学历的农民工也同样面临“短工化”困境。同时,“短工化”现象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一定差异。在代际方面,“短工化”趋势随年龄减小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趋势更强。性别方面,女性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更加明显。

令人深思的是,后天努力未能克服农民工自身“短工化”困境。报告显示,目前工作与上一份工作相比,拥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提升薪酬的比例与无证书的农民工无显著差异。

### 对策:稳定就业和平等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4亿。在当前招工难、寻工难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的背景下,出现“短工化”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为什么“短工化”现象近年来愈来愈明显?如何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指出,“短工化”不利于保障农民工就业权利和个人发展,也不利于促进企业生产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要解决‘短工化’问题,必须对现行以劳动力‘维持’与‘再生产’相互拆分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进行根本调整。”沈原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靳新说,现在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防范风险,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劳务派遣工,万一订单不够就裁员,裁员风险可以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

据了解,2008年以前北京市劳务派遣工不到8万人,去年底激增到60万人。

“实际上,‘短工化’趋势只是一个表象,背后包括资本的力量,资本在用高强度的劳动方式迫使我们今天的劳动力不断地去流动。”靳新说。

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认为,现在“短工化”已经成为了农民工在当前的劳动条件下被迫做出的策略选择。

“如果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雇佣政策,农民工不会‘打短工’,这肯定是一个企业的粗浅的做法。”乔健说,因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好的雇主,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待遇低下,这让许多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事实上“短工化”已日益沦为“临时工”,很多农民工觉得非固定的劳动关系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索性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最后造成农民工、企业甚至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多输”结果。

“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从长期以来的供过于求转向供求平衡,中国未来将面临长期的用工荒,”工众网总裁李久鑫说,“短工化”实质上说明,中国农民工已经可以开始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对工作的不满。

当然,制度调整是一项长期工作。李久鑫认为,“从当前来看,‘短工化’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做好农民工的职业介绍工作,搭建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接平台,缩短农民工的待业时间,从而减轻‘短工化’对农民工、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建表示,做好农民工的就业工作,不仅在于开发岗位和提升素质,更要注重稳定就业和平等发展。

“做好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已提上日程。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劳动者自身的义务,也是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责任,更是各级政府重要的任务。”张小建说。

解析



## 脆弱的民间借贷链条

■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李延生

泰顺县地处偏远山区,属于浙江省仅有的三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2011年财政收入不到6亿元,排名温州区县倒数第二名,泰顺县人口有36万,年均收入不到2万元,但高利贷在这里做得却风风火火。

10多年来,立人集团在泰顺县如同“银行”吸存,显然在当地百姓眼里,立人集团比银行更有吸引力。

那么,立人集团为什么能长期靠高利贷维持不崩盘?立人集团高利贷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利益关系?

### 高利贷的罪与罚

记者调查,在泰顺县,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从商场老板到三轮车夫,从外出打工者到在家务农者,都直接或间接地跟立人集团有借贷关系。据知情人估算,立人集团案涉及泰顺县2/3的家庭。

实际上,从1998年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刚刚创立之初,因生源少,学校难以维持,时任校长的董顺生就决定以高息民间借贷解决资金,于此,立人集团开始跟高利贷结下“不解之缘”。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企业高息民间借贷,用以短期尚可,若作为长期经营之道,无高额经营利润支撑,必然只有采取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将雪球

越滚越大予以维持,若新债不足以偿还旧债,企业就会面临崩盘的风险。立人集团也不例外,当其收入盈利不够归还借款的本息时,别无选择只有疯狂持续地进行高利贷来维持企业运转。

据了解,立人集团高息借贷中,大部分是以学校的名义进行的。立人集团旗下的育才学校包括泰顺县育才高级中学、育才小学、育才幼儿园、育才后勤部等开具借贷凭证。通过育才学校以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机构的信任,收取社会不特定人高息存人的资金。

除此之外,立人集团对于育才学校的教职工,更是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方式,要求教职工每人最低存人20万元,如不存入存够就会被开除,并将存入资金金额与工资挂钩,存入资金越多工资越高,反之工资就低,导致育才学校的教职工成了立人集团高利贷的“重灾区”。这为立人集团最后的崩盘埋下了祸根。

终于,资金链出现断裂,无力支撑的立人集团崩盘。

立人集团独立董事雷小草分析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造成投资失败,一是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集团名下的许多房地产项目跌入卖不动的困境,资金无法回笼。二是集团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投资的煤矿产业,由于提倡节能减排,今年新出的“限产”政策严格控制了煤炭产量,今年仅100

万吨,无法取得预期的回报。三是受温州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人心恐慌,民间借贷“资金池”枯竭,导致资金链断裂。

立人集团涉案金额之巨、涉及人之多,涉案时间之长是近年来少有的。据泰顺县政府组织的工作小组初步统计,在政府部门有登记的债权人人数为四五千人,涉案资金22亿元,而登记的债权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债权人、涉案资金尚未进行登记统计,涉案资金远远不止22亿元。

### 民间借贷成就浙商?

资金于一个企业而言,犹如血液之于人。立人集团一味地依赖民间高息融资来解决资金需求显然是导致企业最后崩盘的重要因素。但现在更要反思的是,为何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立人集团能在“民间借贷”这根钢丝上铤而走险?民间借贷为什么在温州地区如此盛行?

据央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以温州为例,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在浙江,95%以上都是民营中小型企业,都不是靠国家贷款做起来的。”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民间借贷浙江很普遍,是民间借贷成就了浙商。陈俊说,“因为国家银行贷不到款,只有靠民间借贷。实际上,民间借贷越活跃,经济越发达,这是民情所致。”

高利贷的利息很高,有很大利益诱惑,但回报率越高风险越高。

陈俊认为,立人集团之所以能长期依赖高利贷解决资金问题,一方面企业有实体,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另一方面,立人集团在当地办有学校,老板又是本地人,而且企业越做越大,大家就信任了,所以有很大的迷惑性。

陈俊分析认为,做实业跟办教育的思维是不同的。立人集团崩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跨界太大。立人集团是做教育的,又去搞房地产,去开矿。而立人集团进入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就会有很大风险,很难成功。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资金去支撑的,是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一旦资金跟不上,就会垮掉,而民间借贷利息很高,利滚利,这样的高息企业难以维持。”陈俊说。

民间借贷如一把双刃剑,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蕴涵巨大风险。

陈俊认为,让地下钱庄变成地上钱庄,让民间资本阳光化这是我们急于要做的事情。陈俊最后呼吁,对于这种民间借贷,不能动不动就对企业家、民营企业生存确实很困难。